

春情集

刘发清

春 情 集

刘 发 清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粤] 新登字 12 号

春 情 集

刘发清 著

责任编辑 黄 方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路·邮编 510641)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梅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2 千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3-0984-1

G·193 定价: 8.00 元

序

蔡运桂

我与刘发清教授是1987年在深圳作家之家渡假时认识的。我们虽初次见面，但他却象老朋友一样吐露心曲。也许是他的命运过于坎坷，我对他的陈述留下了深刻印象。1988年他调来广州工作后，常在省作家迎春茶话会上会晤，彼此之间增进了友谊。

刘发清出生于梅县山区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艰辛地把他这个独子抚养成成人。由于刘发清勤奋好学，秉性聪明，又酷爱文学，于1954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他只因在《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就被无情的政治风暴所击倒，成为大学生“右派分子”。1958年被分配到西北黄土高原的一所中学打杂，三年后虽然摘去“右派”帽子，可以走上教坛，但仍摆脱不了被歧视的逆境。“十年浩劫”期间，又成了“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在屈辱和恐怖中，渡过了漫长的青春岁月。在西北黄土高原干了二十二年，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1979年平反后，回家乡嘉应师专任教，1988年调入广东青年干部学院。有幸的是近十年间，能心情舒畅地工作，驰聘其才华，撰写了多部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以及一批论文、散文、随笔等等，著述颇丰。

《春情集》是刘发清的散文、随笔、游记等的集子。许多文章深深刻着他的人生足迹与心灵履痕。“春情”者，是

作者在拨开乌云见青天之后，能有挥笔疾书抒发情怀之意也。但书中的主要篇章，与其说是“春情集”，不如说是“苦情篇”。正是作者挥洒自如地抒发其“苦情”而打动人心。

《中国“布鲁诺”的悲剧》，是缅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文章。文章以十六世纪西方哲人布鲁诺因宣传科学的“日心说”，被罗马教皇以火刑处死的悲剧为题，寓有深意。读了这篇文章，看到了为真理而斗争的马寅初的凛然正气。他的“新人口论”是他深入调查研究所得来的科学成果。当时他目睹中国人口每年以千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速度增长，如不加以控制将不堪设想。1957年春天，他向北大师生发表“新人口论”演讲，认为再过50年，中国就有26亿人。《新人口论》于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忧心忡忡地向人们敲警钟：“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正当国人迷醉于“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年代，马寅初凭着正直学者的良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孤身一人，顶风而上，振臂高呼，大唱反调，招来了口诛笔伐。但他始终不屈服，因而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之职，逐出燕园。1979年马寅初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新人口论》得到出版。错批一人，多生四亿。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一个不屈的英魂》是一篇至情至理的悼文，写得凄婉动人。是刘发清为悼念无辜被杀的女同学林昭而写的。文中《哭林昭》一诗，更是感人肺腑。诗最后四句云：“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刘发清与林昭友情甚笃，自分配到西北黄土高原之后，两人书信不断。林昭在一封回信中说：“你我都是共坐

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1960年10月以后，音书中断。19年后刘发清已经“登岸”，惊悉林昭被杀害时，有如晴天霹雳，万箭穿心。林昭出生于革命家庭，1954年以江苏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一手好诗文，是北大的女才子。1957年逃脱不了“右派分子”的厄运。她虽身临逆境，却仍为真理、正义而斗争，1960年在上海被捕入狱，从不低头认罪。“文革”期间，她义正词严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吃了“四人帮”罪恶的子弹。1980年林昭的冤案平反昭雪，报刊还发表文章表彰这位勇敢纯真、为真理而献身的女性。读了《一个不屈的英魂》，使我们想起了张志新烈士。林昭只活了三十五岁。“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更具特色而又感人的是《作贼记》。文中记述作者在黄土高原某中学农场劳动期间一件实事。文章有许多细节描写，类似小说。刘发清当时被派去校办农场看菜地。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粮食奇缺，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于是去偷摘农民的玉米。当他想摘第三个玉米时，被两个守玉米的农民喝住了。他顿时惊恐不已，以为会被手拿棍棒的农民痛打一顿。没有料到农民对这个偷玉米的“贼”寄以同情。晚上当刘发清痛恨自己做错了事，胡思乱想，辗转难熬的时刻，那“捉贼”的农民，悄悄地向屋里抛进了六个烧烤过的玉米棒子。此事令刘发清永生难忘；“他们那颗淳朴、宽容、厚道、富有同情之心，至今温暖着我的心田。”刘发清当时狼吞虎咽地吃那农民施舍的烧烤的喷香的玉米，觉得是有生以来吃的最饱、最美的夜餐。这是时代悲剧里所产生的一出小喜剧，

令人读之回味无穷。

《春情集》中，还有许多描写名山胜景、地方习俗风情、凭吊历史英杰等等好文章。如《祁山行》、《牛坟》、《黄山观日出》、《失败的英雄》、《我的祖传秘方》等。写自己所见所闻，有感而发，是富有内涵的结结实实的作品。刘发清虽年逾花甲，从繁忙教学战线上退下来，但他身体尚好，“余力”还旺盛。望他更加辛勤笔耕，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

1995 年 8 月 12 日

目 录

序.....	蔡运桂
一个不屈的英魂	
——忆林昭.....	(1)
中国“布鲁诺”的悲剧	
——缅怀马寅初校长	(10)
短暂与永恒	
——怀念与王瑶先生一次会面	(19)
我的“祖传秘方”	(22)
天赋的燃烧	
——黄伟经译《处女地》序	(27)
“葬诗魂兮墨江浒”	
——黄遵宪与日中传统友谊	(31)
牛 坟	(37)
红白草莓	(40)
作贼记	(43)
扁扁马莲草	(49)
进京杂记	(54)
黄土高原动物拾趣	(59)
陇南风物	(68)

家乡的“龙须菜”	(75)
蜜蜂趣谈	(77)
祁山行	(84)
“年岁超盘古 举止犹天真”	
——陇南大熊猫保护区见闻	(87)
天涯海角鹿回头	(91)
黄山观日出	(93)
黄山石工	(96)
失败的英雄	
——参观洪秀全故居有感	(99)
“死在黄花骨亦香”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巡礼	(103)
阴那风情	(106)
《阴那山志》及其他	(111)
春情如酒暖人怀	
——《海外文谭》后记	(115)
赞客家精神	
——《客家名人录》代序	(118)
清末中美外交实录	
——《出使美日秘日记》点注前言	(121)
秘鲁华侨血泪史	
——点注《出使美日秘日记》摭拾	(137)
小文章的魅力	
——《外国大文豪故事》后记	(139)
闲思长短录	(141)

“本地姜不辣”乎？	(146)
黄遵宪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转变	(148)
“布袋和尚”及其他	
——黄遵宪名字号小释	(167)
略谈《三国演义》关羽形象塑造	(169)
小议“清官”和“清官戏”	(172)
后 记	(174)

一个不屈的英魂

——忆林昭

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林昭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了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端庄，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雅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

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惭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之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我们毕业生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五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看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讥讽的

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一样冷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

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五元钱。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铤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三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唯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

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二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

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300斤、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27斤，还有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情厚藉翰华长。

减卿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啁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宣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1981年第三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